

# 学习、交流与抗争: 作为媒介的民国报纸展览研究\*

■ 郭 冲 朱至刚

**【内容摘要】** 1920年代以来,“报纸展览会”作为“新知”逐渐见诸报端,进而被国人熟知、利用。在由“新知”到“旧闻”进而到“惯习”的转变过程中,报展经不断调适,逐渐生发出作为媒介的“交流”“学习”与“斗争”的丰富意涵。细究这一现象,笔者以为,报展媒介意涵的转变背后析出的是我国新闻职业化的不断推进和新闻职业团体的渐次发展。而报展的斗争意涵转向,则展现出民国时期我国新闻界在“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视阈下所做出的抗争。

**【关键词】** 民国报纸;展览会;新闻职业团体

20世纪以来,作为我国新闻学发展的显性趋势,新闻职业化与学术化程度不断得以推进。同时,新闻国际交流日益昌盛。在此趋势之下,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报纸展览会于近代新闻史中初见端倪并被广泛运用,是贯穿于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的一种常见的新闻交流形式。1920年代,作为西方近代化的标志产物之一,报界展览会于当时国人而言,本身就处于“新知”<sup>①</sup>的范畴之内。此后,随着我国政治局势的转变和新闻职业化的推进,报纸展览逐渐越出“新知”的边界,在观念上和实践上渐为新闻界所熟悉并常用。细查史料可发现,它不仅常常见诸于民国各种报章之中,也是报界学者、报人等群体反复言说的对象。

有关近代报纸展览会的研究,目前不算繁盛。有研究以上海复旦大学1935年世界报业展览会为中心,探讨报业展览会的作用和影响<sup>②</sup>。但因个案研究的视角局限,无法在历时性角度观照报业展览会这一事实上贯穿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新闻媒介,且视野也易固定在复旦这次报纸展览之中,没有详述报纸展览会这一媒介的功能的演变。因而,无论从媒介意义、抑或是历时性立场,报纸展览会相关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值得探讨的是,报纸展览会在我国的发展,随着国家时局和新闻职业化的变迁,逐渐被国人用以实现不同的目的,因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意涵。德布雷提出,具有中介行为(mediation)的媒介,可以指社会交流规范、物理载体、传播设备、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等不同的方面。<sup>③</sup>如此,媒介研究跨出了文字语言,走向了其他意义载体,如行为、场所、仪式,媒介也被赋予精神的、智

力的意义。<sup>④</sup>本文不妨将报纸展览会视为附带“中介行为”的媒介,来考察其中介行为“行动”上的变迁和意涵上的演化,并推演其原因。

有鉴于此,笔者借鉴媒介中介行为概念,从不同的维度来阐释报纸展览会作为媒介所表现出的“中介行为”的意义和功能。本文以民国时期的报纸展览会为切口,并将其作为媒介来阐释当时国人对于报纸展览会的认知与利用,以及在此过程中,报展被赋予的意义和被希望达到的目的。借此,本文尝试管窥媒介意义上的报纸展览会及其得以组织的社会背景的变迁。

## 一、互通有无: 作为信息交流媒介的报展

1851年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已颇具声势。毋庸置疑,作为工业革命近代化产物的代表,展览会(Expo)本身就为促成交流而设置,自然已经具备了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1928年德国科隆市长亚戴诺博士(Dr. Adenauer)建议举办世界报纸博览会。作为“破天荒第一次之万国新闻博览会”<sup>⑤</sup>,它“对于中国的出品存着极厚的希望”<sup>⑥</sup>并在会场中建立中国馆,我国因此得以参加世界报纸展览。而作为交流的另一方,世界报展恰可与我国新闻界此时对于国际宣传的呼吁和诉求相合“对于国际间不可不有正当之宣传,以使外人明了吾国国中真正之情形”进而“对内可使国家政治清明,对外可使国家主权独立”<sup>⑦</sup>。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展览会不仅作为“新知”传入中国,且这种“新知”意义上的“媒介”首先搭建的即是世界范围的交流。有关报刊信息的共享、新闻业发展等问题自然而然得以在这种平台上进行共享。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际交往与社会交往: 戊戌时期的士林与维新报刊”(13FXW004)的研究成果。

据记载,我国参与展品有古代报纸、早期近代报刊等在内的10多个种类,上海各大报如《申报》等,中共中央机关报如《向导》等,新闻学著作如《中国报学史》等,部分省份报刊如武汉《汉口中西报》<sup>⑧</sup>甚至画报《红玫瑰画报》《紫葡萄》<sup>⑨</sup>等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sup>⑩</sup>。虽因国内局势“祸乱之故,政府及报界自顾不暇”<sup>⑪</sup>以致“中国内地,应者寥寥”<sup>⑫</sup>,但德国科隆世界报展本身作为媒介的交流意义不可谓不大。该会以直观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报纸的历史和近况。中国馆甚至雇佣了曾参加1927年德国德来斯墩(Dresden)世界报纸博览会的制桑皮工人林宗岩、朱旭亭二人赴德,在馆中当众工作。<sup>⑬</sup>

对于中国亲历者、参观者而言,此次盛会带来了一定的新鲜感和信息冲击。以王万叶为例,他在《北洋画报》《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游览观感。在详细记录博览会基本布局、风景人物、建筑设计等“不知能否于此数十年中,使在中国一见”<sup>⑭</sup>之余,王万叶提出“深盼诸君子努力进取,为国增光也”<sup>⑮</sup>的愿景。赴欧考察的戈公振则也“遍览外国部各馆”,发现“几一致为广告作用,尤以俄国馆为最”这种展览风气,两相对比,不得不发出“我国为造纸及有报纸最先之国,大可借此宣传,何国人——尤以与自身有关系之报界——漠视至于如此也”的感叹<sup>⑯</sup>。尽管国内报界参展不算积极,但此次报展信息依然传入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时报》《晶报》等报刊都刊登报道,《良友》画报还以较大的图片篇幅报道了德国报章博览会。

作为信息分享和宣传交流意义上的媒介,报纸展览会天然地具有信息传递的职能。国内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报纸展览会首先都作为业内信息交流的平台而存在。举例而言,学校报纸展览诸如1933年燕京大学报纸展览会由旨在“做学术的研究,俾后觉者有新启示”<sup>⑰</sup>的“新闻讨论会”所组织,1935年复旦世界报纸展览会,初衷是“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唤起研究”“便于观摩”、以及谋“新闻教育与报业合作”等,促使中外、古今、偏远地区与报业林立之地、一般民众与报业、新闻院校与业界之间的交流<sup>⑱</sup>。两校均意在沟通新闻院校教学与社会新闻业态。再如,抗战时期大后方报纸展览往往起到沟通抗战国统区、敌后、敌伪区与国际等的报业近况和斗争形势的作用。1943年,“坚持浙东敌后艰苦斗争之报界同人……举行报纸展览”,各沦陷区的敌伪报章杂志也陈列出来,“以俾浏览敌伪奴化我国政策之一斑”<sup>⑲</sup>;而新闻团体报展不仅能向社会大众传递报展及报界信息和动向,还帮助构建团体之间、团体与大众、团体与政府等多边沟通。例如,1936年2月底3月初,武汉新闻界举办“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展品包括1935年杭州全国报纸展览、上

海复旦大学世界报展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的全国儿童读物展览会的全部展品,还借调了国民党中央当时举办全国报展的部分展品,意在“以此提高民众知识兴趣、沟通民众与政府的隔膜,扩大儿童求知范围”<sup>⑳</sup>。

依托于具象建筑空间的报纸展览会,属个人和集体行为意义上的中介,既可承担基础的交流作用,还可作为思想形成的模式完成“中介”的功能。除开展报展作为媒介而建构的直接意义上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以外,基于“作为物种”<sup>㉑</sup>的报展媒介所展开的纷繁的多线索信息交流意义复杂而深刻。以德国世界报展为例,其首先展开的信息交流是为征集展品、筹建中国馆的努力。德国外交部委托德使馆致函我国北京外交部,我国旅外有心人士也驰函国内相告。从官方函告到私人委托,于德国而言,为筹办报展展开的交流不可谓不密集。至于国内,为筹集展品,信息的交换和传递也不断累加。因困扰于国事,德国的外交函件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旅外人士的私人信件也孤掌难鸣。博览会遂委托德国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博士和柏林中国通讯社主任廖焕星代为筹集。该学院认为新闻学刊社“以推广中国新闻学为事,想于此事,必能得蒙诸君子之赞助”<sup>㉒</sup>。故而黄天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承担了征集部分展品的任务。为帮助筹得展品,张元济在回复卫礼贤的信件中也曾做出“敝馆敢不勉力赞助……当囑敝馆交通科量为照办”<sup>㉓</sup>的承诺。围绕报展的举办,来自报章的报道、其他团体的祝贺等交流形式也随之展开。如,1935年复旦报展,《申报》《字林西报》《新闻报》等多家报社纷纷报道自不必提,杭州新闻记者公会、江苏新闻学社、上海儿童书局等均发来贺电,甚至罗马教皇东方神父塔爵士钱曾祺也发来庆贺状。<sup>㉔</sup>

报展举办前后,与其他媒介的互动进而开始,展开的交流意义也往往由其他媒介所主导。仍以德国报展为例,我国媒体对其从图片到文字、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方位关注报道构成了进一步信息交流的主要内容。而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人而言,作为西学东渐的“新知”之一,报展的媒介意义还体现在国人对其由“新知”到“惯习”的转变。素有国内报业从业经验的戈公振在欧洲访问时,曾提出“博览会性质,以报纸为主体者,吾未前闻,有之,自科恩始。”<sup>㉕</sup>可以推测,1928年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之前,上海新闻学会虽曾于1926年1月在上海举办过“南洋各报展览会”<sup>㉖</sup>,但报展对于国人来说,仍是鲜少听闻的新鲜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德国采用官方函件和私人联系等多种方式,也并未唤起我国新闻界参展的广泛热情,以至“京津沪大埠报界同志,莫不袖手观望”<sup>㉗</sup>了。如前所述,德国世界报展经由亲历者所发报道、图片传入国内,先见诸于诸类

报端,进而引起国内新闻界广泛关注。此后,戈公振、胡道静、黄天鹏等新闻学研究者、教育者均在著述中提及此次报展。甚至,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报展依然出现在我国的报刊杂志之中<sup>②</sup>。

与报展被国人反复提及几乎同时,报展也逐渐在国内走出“新知”的范畴,变为“旧闻”。在此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除了作为一体两翼的学者、报人的反复言说之外,还有国内不断涌现的依托于各种新闻团体、机构举办的报纸展览实践本身。1931年8月8日-10日,考察归来的戈公振在杭州西湖罗苑举办中外报纸展览会,陈列了他在英法等国考察带回的照片、报纸以及邵飘萍、徐宝璜、蒋国珍、任白涛、黄天鹏、谢六逸等人的新闻学专著,吸引了大批新闻名家、名记者。

随着报展这一媒介形式的渐趋成熟,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以后,它所带来的交流意义上的“媒介行为”几乎成为国内新闻学界、业界的常规选择而在目标、规划、执行、性质等方面渐趋固定,并在多区域、多省份不断出现。史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以后,除了展出报刊数量因受到战乱影响而有所减少外,我国报展举办数量、举办区域都呈增势,甚至出现“报展年”<sup>③</sup>,展览种类也分化为全国报展、世界报展、敌后报展、儿童报章杂志展、特种报展等多种。同时,我国报章持续保持对国际报展的关注。比如,1931年开幕的伦敦报纸展览会也有国内媒体对此展开报道<sup>④</sup>。至20世纪30年代,作为“惯习”的报展,其功能和意义已得到官方肯定与参与。1935年,国民党当局收到朝鲜日报社世界各报展览的华文样报征集要求时,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认为该报展“实为我国报纸表现成绩,向外宣传之良机”,特准中央宣传委员会向全国按地域征集,经由领事馆转交朝鲜该报社。<sup>⑤</sup>20世纪40年代以后,县级单位已可自如举办报展。1941年,“为介绍各地报纸,引起民众阅读报纸兴趣”,江西广丰县民众教育馆筹备全国报纸展览。<sup>⑥</sup>

须加注意,经验性事实——“报展热”现象本身,既是作为媒介的西方报展在国内交流意义上进一步扩散的明证和结果,同时也是促进我国对报展作为媒介的共享意义建构的中介。与之相对应,国人对于报展的认知,也从20世纪20年代仅惊叹于“西方新闻家探访术之神妙”<sup>⑦</sup>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的“影响我国文化前途者亦甚巨”<sup>⑧</sup>。1933年,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书籍中出现词汇“报纸展览架”<sup>⑨</sup>,说明此时报纸展览确已成为社会的显性话题和常规活动。而报纸展览架作为“记录和存储的物质载体”之一,则彰显了报展作为媒介的这一面相。如此,经由“舶来之物”——报展这一媒介及其所产生的中介行为,在尚未完全近代化的我国,不仅搭建了第一层面的信息交流意义,更逐渐生

发出新的“次生的”交流意义来。

## 二、“学然后知不足”<sup>⑩</sup>:作为学习与示范媒介的报展

信息交流意义上的报展媒介由1928年的德国“旅行”<sup>⑪</sup>至国内,报展这一“新知”逐渐被国人接纳。彼时,国内新闻职业化浪潮刚刚兴起,新闻职业团体和新闻院校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和背景下,报展这一媒介迅速被报界同人和新闻院校关注和使用。报展在国内的延续运用与新闻职业团体、新闻院校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主导了民国报展的性质和媒介意义。而这两条线索,为报展在国内的媒介意义的延展、转化和再组织提供了可供依靠的主体,也为后者的发展路径奠定了基调。作为观念的“报展”,在此过程中,从“新知”转向国人耳熟能详的“旧闻”,进而在新闻团体、新闻院校等的实践展开和特殊意涵赋予之下,不断转化为媒介共享意义上的“惯习”。

由“旧闻”到“惯习”的报展,首先诉诸的媒介中介是其作为学习媒介的功能。此时,我国正处于新闻院系筚路蓝缕、纷纷涌现时期。经由德国报展亲历者在报章杂志上的推广,以及其中之一戈公振于1931年在杭州办报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开了沪苏浙等地区的报展风气,促使报展作为媒介行为的渐次推广。

1931年杭州报展的参观者之一、新闻学系系主任谢六逸参与筹办了1935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世界报纸展览会。据记载,该报展的举办源于复旦新闻学会会员的提议,“展览会的举行,一面用以引起社会人士对于报纸的兴趣,促成报业改良,一面借此充实新闻学系的内容……”<sup>⑫</sup>可以看出,在复旦筹办者那里,报纸展览的初衷就包含推动校内新闻系学生之间、校外新闻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学习。在7天的展期内,复旦世界报展展出展品超3000件,参与人数过万人,在我国可谓规模空前。不仅如此,主委会在闭幕之前依然收到了“许多口头或书面的要求,希望展览会能再延长几天,以便外地以及没有看过的人有参观的机会”<sup>⑬</sup>。中国寰球学生会会长朱少屏以江湾地理位置偏僻为由建议能到上海展览一次。虽然这些要求都被主办方以人力、物力等限制为由婉拒,但足可见复旦世界报展的规模以及对学、新闻团体和新闻界的学习意义。

《申报》评价该展览“足使吾人自知所短,力求改进之道”<sup>⑭</sup>,《新闻快活林副刊》称其“引起人们对于报纸传说的不少兴趣”<sup>⑮</sup>,《新人周刊》则认为此次报展“尤其是在新闻事业落后的中国,这一番举动不能不说是相当的需要”<sup>⑯</sup>。储玉坤也评价它“唤起一人士对于报纸的兴趣,其意义甚为重大”<sup>⑰</sup>。

1939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同学举办报展,希望“能以‘他山之石’作为我们新闻立论的借镜”<sup>⑱</sup>,展出

多达41个海外国家的报纸178种,杂志160多种,仅华侨报刊就有来自19个不同地区的20余种参加展出<sup>45</sup>。在战时为该校学生和新闻界交流、学习提供了良机。报展的学习功能不为新闻团体、新闻院校报纸展览所独有,作为个体的报刊也充当着报展的学习媒介。抗战时期,新四军根据地报纸《拂晓报》油印技术高超、版式新颖、墨色均匀,曾发行到世界各地,且多次参加国外报展。1943年,在法国“万国新闻报纸博览会”上,《拂晓报》堪比铅印的油印成品受到当地参观者的关注。<sup>46</sup>

20世纪30年代,囿于经验、人力与物力,于新闻团体、新闻院校来说,举办上述规模的世界性报展不算易事。不过,随之展开的围绕报纸展览的互相学习和借鉴倒经常出现。1935年,杭州新闻记者公会举办全国报纸展览会,展出报刊1455种,参观量超过3万人次。在全国新闻界、教育界影响力都非常大。该展览仅征集工作就向全国各新闻记者公会、新闻学会、各大学新闻系、各报社通讯社及新闻学家及史料收藏者求助。有鉴于此,复旦新闻系派遣报展筹备委员会学生盛澄世、舒宗侨赴杭取经并借调部分展品供复旦报展使用。而杭州方面认为对培养新一代报人有帮助,才欣然应允。出于类似的考虑,在南京全国报展筹备会杨铎、仇培之的商调下,部分展品也转移到南京。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作为媒介的报展,不仅可发挥原生性的学习职能,也已成为学习、交流的媒介,且这一媒介作用渐成网络勾连之势。

基本意义上的学习、交流或可为国人带来“新知”、反思自我、观照业界。可以看到,20世纪20-30年代,基于报展媒介的学习意义,内容上的共享、报展本身成为学习的对象而非途径使得依托于各地新闻团体、院校、个人等的报展在展出模式、展览持续时间、展品征集、宣传方式等方面趋同、进而被固定下来。而在几乎同一进程之中,自1935年以后,报展作为媒介,其形式溢出原本的内容层面上的学习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发挥横向的“示范”作用,成为固定的“仪式”,以新闻团体、新闻院校为提托,被逐渐固定下来,进而演变成为一种新闻界之“惯习”。

1933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修正新闻检查法”,设置新闻检查所,要求各报送检小样甚至大样。在新闻界抗议之下,行政院于民国廿二年九月一日通令全国保护新闻记者。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全国,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响应以及国民政府当局行政院的核定公布。故而杭州记者公会才在1935年首届记者节举办全国报纸展览以示庆祝。此后,报纸展览逐渐演化为国内新闻组织、新闻职业团体等庆祝九一记者节的标志性活动之

一。于新闻界而言,报展这一媒介逐渐由认知层面上的“旧闻”转向意义层面上的“惯习”。作为与新闻组织“捆绑”在一起的标志性纪念活动,报展被国内新闻界赋予反对新闻检查、倡导新闻自由、保护新闻记者等多方面意涵,成为新闻同人意义共享的媒介。

在此之后,尽管我国战火绵延,每逢九一记者节,报纸展览往往都是庆祝活动的选择之一。1941年,坚持浙东敌后斗争的报界同人筹备纪念九一记者节活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举行报纸展览进行纪念,展品包括根据地报纸、大后方报纸、华北八路军报纸以及日伪区报纸等,并举行座谈。<sup>47</sup>1942年8月,嘉定记者联谊会成立,为庆祝九一记者节,该会于9月1日至3日举办蒋介石访问印度照片及报纸展览。<sup>48</sup>1947年记者节,上海市记者公会举办由胡道静、杜绍文收藏的特种报纸展览会以示纪念,并举办新闻摄影展览。<sup>49</sup>

除了九一记者节这一特殊的纪念意义外,从另一方面来看,报展还是新闻团体、院校成立、周年纪念活动的标配之一。作为“共享意义”的另一个面相,有关报展这一惯习的生成,虽未必完全脱胎于早期的新闻团体,但至少与其息息相关。据笔者有限的史料掌握,我国首次举办的报展约为1926年上海南洋报纸展览会,该展览由上海新闻学会主办。<sup>50</sup>1926年3日,中国首次报纸展览本就是上海新闻学会委员会就职,为增加会员感性知识而举办。此后,1935年,名噪一时的复旦世界报纸展览会也是“本校将在本年秋季举行三十周年纪念”的情境下,“为庆祝这个盛大的典礼”而献礼。<sup>51</sup>在强大的“示范”作用之下,报展在我国不仅逐渐被国人熟悉,成为“旧闻”,并且不断本地化,被赋予独特的第二重意涵——“纪念”“庆典”。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在这一层面上,报纸展览会被新闻团体、院校进行媒介中介的传播和意义的共享,成为另一种镶嵌着“庆祝”含义的惯习。

1939年,新闻系同学为庆祝中央政治学校校庆,冒着日本敌机的轰炸在校园内举办报纸展览会。<sup>52</sup>1944年4月,为庆祝成立4周年,民族文化馆在抗战中举办浙西首次全国报纸杂志展览会<sup>53</sup>,“举凡边远省份及各种特殊性报刊,均极齐备”<sup>54</sup>。1947年9月18日,“郑州《春秋时报》社为纪念该报创刊两周年,举办河南新闻史上首次全国报纸展览”<sup>55</sup>。1948年12月5日是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七周年院庆,新闻系师生“特别用了一个全国报纸展览会,来作为庆祝的节目”<sup>56</sup>。

这样,自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兴起的报纸展览会,在特殊的形势之下,原生性的交流与学习意义得以沿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我传承,总是要通过中介才得以实现”<sup>57</sup>,在“新知”向“旧闻”转化的过程里,报展被本土化实践赋予了记者节的纪念意涵和新闻团体

的庆祝意涵。本土化以后的报展,其共享意义即使在战时仍被广泛传播,直至意涵不断稳固下来。

### 三、民变蜂起、不平则鸣:作为抗争媒介的报展

报展的本地化演变仍在继续。其作为媒介的文化影响,根据环境动因逐渐产生分化。而战时状态下的中国,通过影响作为文化主体的举办者而操纵着作为客体的“报纸展览”,并不断转化其功能和意涵。

如果说附着在报展之上的庆祝意涵和纪念意涵是报展作为媒介的转化与本土化,那么报展在我国所生发的斗争性媒介意义应是其在被接纳和吸收过程中接受的较大限度的改造。事实上,容易被忽视的是,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早声名鹊起的世界报纸博览会——德国科隆报纸博览会的举办本身就蕴含一定程度上的斗争意义。戈公振曾提到该展览设置的初衷“科恩人创设此会,一方庆自由恢复、一方且将提醒世人,勿忘莱茵河畔,尚有未撤之法比军队在。”<sup>③</sup>普鲁士总理在展览上的致辞印证了这一点,“……有陈列室可以发见……经何种奋斗,始获得言论自由。夫政府检查,警察干涉,胥为新闻事业进行上之障碍,而言论自由,在革新时期,需要尤切。”<sup>④</sup>由此可见,于德国人而言,世界报展设置的本意就包含文化交流与反对战争、追求新闻自由的独特意指。

以笔者掌握的有限的材料来看,除戈公振的见刊报道外,未见我国报展在媒介意义上对德国1928年报展反对战争、追求新闻自由意涵的继承和发扬。但巧合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报展形式逐渐风靡,让它声名鹊起的1935年杭州新闻记者公会报展和上海复旦大学报展都不约而同的附带并彰显了抗争的意涵。而此时,正值我国战火纷扰之际。可以确定的是,国内战乱的社会背景是促使作为媒介的报纸展览的意义得以转化的根本动因之一。

基于媒介的斗争意义层面,不妨重新来审视1935年杭州新闻记者公会举办的全国报纸展览。如前所述,1935年杭州全国报纸展览,为杭州新闻记者公会为庆祝创立九一记者节而举办。往前追溯,这次报展的举办和记者节的争取都是斗争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杭州报业、新闻团体较为发达,阅报运动、会员大会等运动声势如火。在国民党当局1933年通过“修正新闻检查法”,设置新闻检查所检查报纸小样、大样的新闻控制背景之下,自来“以报纸为传播与推进文化之利器”的杭州新闻记者公会遂奋起反击,通电全国新闻界要求言论自由、力争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这一斗争得到上海、北京、南京各报包括《中央日报》《南京朝报》《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等的支持。<sup>⑤</sup>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作为庆祝而设立的九一记者节和报展,本身就

附着着反报检、促自由的意义。而这次报展在全国新闻界的影响连同反检查运动引发的全国支持一道,为报展这一斗争意义的扩散提供了平台和语境。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紧随其后的上海复旦世界报展虽意在取长补短、谋取合作等方面。不过,在上海社会风气动乱、危及高校安全的背景之下,即使是校园报展的意涵也在发生转变。据复旦报展9位主要学生筹备者之一的舒宗侨回忆“从20年代到30年代……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獗。在上海的各大学里,他们通过各种秘密的组织,并用种种卑劣手段来夺取和霸占各级学生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学习和交流意义之外,复旦报展的斗争意义不断加强“我们筹备报展,大家在思想上都有一个以实际成绩回答和抵制反动学生破坏活动的思想,因而,我们干劲就更大”。<sup>⑥</sup>新闻活动无法孤立于社会,报纸展览会亦如是。处于这种风气下的复旦学生报展,其背后蕴藏的反迫害的斗争性印证了这种逻辑。

战争局势日益加剧,报展的斗争性媒介意义也不断发展、扩大,在此之中,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全国记者团体,发起成立于1937年的“青记”相信“新闻宣传工作的影响,对于抗战有非常重大的作用”<sup>⑦</sup>。从史实上看,“青记”组织过不少报纸展览。1938年,由汉口迁入重庆的“青记”,为抵制国民政府对解放区的封锁、反对新闻统制,在重庆社交会堂举办全国报纸展览。<sup>⑧</sup>据冯英子回忆,“通过这一次全国报纸展览,将解放区生机勃勃和英勇抗战的面貌,介绍于重庆人士之前,也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封锁,鼓舞了大后方人民对抗战的决心和斗志”<sup>⑨</sup>。

1939年1月,“青记”重庆分会在重庆举办全国报纸展览,展出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其中,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报纸表现卓著。作为媒介的报展肩负着“青记”展示新闻抗战、民众抗战的努力这一功能,客观上,报展也鞭策了国统区新闻工作者。<sup>⑩</sup>在青记的各地分会如火如荼之际,报展这一媒介也被用于各地斗争之中。湖南“青记”与《力报》、西安“青记”与蒋慕岳等都曾举办过规模不一的报展。举办报纸展览,作为“青记”在国统区展开的“合法斗争”<sup>⑪</sup>武器之一,在该组织不断扩张之际,报展的斗争媒介意涵不断延伸,进而固定,成为抗战时期国统区乃至敌后等多区域的共享意义。

与“青记”类似,虽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展规模较小,但“斗争”的意涵却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推进。1941年2月22日,延安《新中华报》举办全国报展,该报直言,“身临会场,如亲临中国进步与保守、光明与黑暗两大思想潮流决斗之战场”,同时,该报展

对大后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海外侨胞、及敌伪等“作一全面的鸟瞰”<sup>⑥</sup>,其战斗意义不仅包含反侵略、追求新闻自由、要求民族独立,还包括反国民党新闻统制等部分。此后,作为抗争的媒介,报展虽未达国内遍地开花之势,但也多见于各地。1941年4月盐城敌后报展、1943年浙东敌后报展、1944年《民族日报》敌后报展、康德《力报》敌后报展、1939年初延安抗日根据地报展等等,无不映现着报展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斗争意涵。作为文化斗争的一部分,部分地区如苏皖边、豫苏皖边报展依托于当地的文化协会而举办,与出版刊物、举办美术展览会、编排歌剧等形式一道,作为抗敌斗争的宣传武器而存在<sup>⑧</sup>。

战火绵延之下,国统区报展也启用了该媒介抗敌斗争的职能。梁寒操评价1944年《中央日报》全国报展时提及“其性质实即日本帝国主义者罪行的一种记录……一定可以燃烧着观众的愤怒之火,提高他们对于这次反侵略斗争的战斗意志与精神力量,同时也指示着今后为争取光明与自由所应采取的正确途径”<sup>⑨</sup>。

就展出区域而言,我国报刊还曾作为战斗媒介的代表,跨出国门,被送往多国参与报展。例如,在“青记”和中共的努力之下,《拂晓报》不仅发行至包括东南亚、亚欧在内多个国家,且多次参加海外报展,并曾经作为我国“斗争”媒介的范本,参加了1940年的美国纽约<sup>⑩</sup>和1943年的莫斯科国际反法西斯的敌后报纸展览。<sup>⑪</sup>

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报展不仅作为第一性的互相学习、交流的媒介而存在,同时,其“斗争”的属性纷至沓来。作为斗争媒介的报展,其意义的演变与我国国内的斗争形势息息相关。并且,随着抗日战争范围的扩大、程度的加深、错综复杂的矛盾的演变,报展的斗争意涵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丰富和深化,反对新闻检查、追求新闻自由、反迫害、反侵略等意涵渐次累加。具体而言,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两次报展举办于1935年9月和10月。此时抗日战争虽已打响,但长三角地带仍处国统区,其新闻界主要面临的问题仍是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界新闻自由限制的不断加剧和各种势力对新闻院校的迫害。因而,上述两次报展当仁不让地肩负起反迫害、追求新闻自由、反新闻检查的重任。

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青记”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面对的不止是抗战这一基本矛盾。首先,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报刊的打压、限制与检查也日益严重;其次,身处国统区的尴尬处境,迫使青记不得不坚持合法斗争,以博取刊物的继续出版和组织长期存续。沿着这两种考虑可以发现,作为媒介的报展在两

种意涵层面,都近乎完美地契合了“青记”的需求。首先,报展本身的媒介功能意在交流、学习,出于敌占区的不断扩大,青记可以通过举办不同范围、地区的报展来达成国统区、敌占区、敌后等的新闻交流、经验学习与共享;其次,为争取新闻自由,激进的暴力手段恐受制于“非法”的口实,而报纸展览会作为合法斗争的武器,其优势不言而喻。敌后根据地等其他地区的报展大致也可循着这一逻辑。

报展的斗争性媒介意义,在复旦与杭州报展之后,经由青记、敌后根据地的不断强化,以及国统区的沿用,其意涵逐渐得以确定下来并在抗战中广为出现。无法否认,战时几乎割裂的国内各个区域,都居于抗战的“共时性”之下。斗争性媒介意义的出现,暗合了当时现代性的进程。时空分离和虚空给报展协调社会活动、规则化社会关系提供了契机。抗战的特殊状态要求并激发了报展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性的功能。“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sup>⑫</sup>。于抗战中的报展筹划者、参观者、报道者乃至被报展影响所覆盖的区域而言,报展的现代性意义相当于舒德森笔下的“博物馆化”,二者都作用于当地民众对民族和现代性的想象,而区别在于,报展付诸于“斗争性”意涵,侧重“民族”性的唤起。

战时国统区、敌占区等区域地理上的割裂状态造成一定程度上信息沟通的阻滞乃至隔绝,纸质媒介本应充当构建、唤起、激发民族意识的主要载体,但其受限于战时的物资、技术短缺和发行网络阻滞等问题,其影响难以扩大。而不同于纸媒的是,报展具有主题较易赋予和意义较易集中呈现等特点,故而它部分取代了纸媒的角色,开始展开后者的这种构建、唤起和激发民族斗争意识的作用。

直至20世纪40年代,报展成为新闻院校、新闻界、新闻团体等的斗争媒介不断涌现,并且渐成互为配合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报展意涵的侧重也逐渐产生位移,从最初的重在“交流”“学习”偏向“学习”“交流”与“斗争”“反抗”并重。而这些意涵及其演变之径,也在反侵略形势及“民族”意识构建和传播的背景之下,作为共享意义逐渐被国人所接受。

#### 四、结语

细查报展发展背后的线索,时代的变迁和战争的加剧当然是深层原因。在此之外,从新闻业发展本身的逻辑和视角切入,或可探寻新闻业发展、新闻职业化不断推进的显在浸润作用。20世纪20年代,我国新闻职业化不断发展,表征之一就是职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而我国报展的初现也在20世纪20年

代。这可能不是偶然。

组织化的材料如果没有物质化的组织的支持是无法延续下去的。显而易见的是,民国报展与新闻组织是共生关系。几乎所有的报展,背后都有新闻院校、新闻团体等组织的牵头和筹办。清季以降,士绅结社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各类社团数量不断增加。<sup>③</sup>晚清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式教育的兴起、现代职业分工的产生,使报业成为一种蕴含自由价值、职业价值、生活价值的现代自由职业。<sup>④</sup>1905年,《时报》倡议成立报界团体,认为“夫报馆同盟,诚厚报纸之力之不二法门也”。<sup>⑤</sup>有学者考证,我国最早的报界团体为1906年7月1日成立的天津报馆俱乐部。有研究认为,直到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在上海成立才意味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闻记者的自由职业团体出现<sup>⑥</sup>。而我国早期报展“南洋各报展览会”就是由上海新闻学会举办的。

新闻职业化进程的加剧加速了新闻团体的发展,而与此同时报纸展览的规模、质量、影响范围等方面也在不断走向成熟。复旦世界报展即脱胎于新闻研究组织——复旦新闻学会的倡议,“复旦新闻学系,向有新闻学会之组织……新闻学会举行春季首次大会,由会员提议在本校三十周年纪念时举办报纸展览会”<sup>⑦</sup>。新闻学会还为此向学校申请经济援助。杭州全国报纸展览会主办方是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它的前身——杭州新闻记者联合会自创办以来就不断开展阅报运动、

演讲、援助记者、参与废约运动。抗战时期,报展多数依然依托于报界团体而存在。如青记组织、筹备的诸多国统区报展。此外,另有部分报展依托于新闻院校和报社等新闻相关组织。

社会形势的转变和战争进程的加剧也从“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视阈为报展的媒介属性和意义变迁提供了转换的植根之处。现代性不仅指组织的种类,还指组织过程本身,即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控制<sup>⑧</sup>。随着反侵略战争的逐渐深入,报展连同报纸一起逐渐被赋予重唤民众民族认知与反抗意识、促使社会关系斗争化再组织的媒介意义。这种意义的外在表征就是报展由信息传递、学习共享意义向斗争性意义的转型。

从这个范畴上看,民国报展的发展路径,紧紧依托我国社会现代性和新闻职业化的进程而推进。而作为意义共享的媒介,无论其交流意义、学习意义抑或是抗争意义,无不植根于民国时期国内形势的变化。作为媒介的报展,其意义的变迁,既与我国社会现代性发展轨迹相一致,又深深打上了时势变化的烙印。从域外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到深深植根我国时事的“媒介”,报展意义的浮沉和变迁经由“新知”“旧闻”到“惯习”,本身既是时代发展的注脚,也是本土化重塑的范例。直至1949年以后,报展虽逐渐褪去“斗争”的媒介意义,但作为“学习”和“交流”的媒介依然显见于新闻界。

#### 注释:

- ① 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年第43卷第12月号。
- ② 齐辉《民国报业展览会与现代中国新闻业的成长——以上海世界报纸展览会为中心讨论》,《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0期。
- ③⑤⑦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 ④ 鲁曼《作为媒介的大钟楼:城市现代性的构建与流动——以合肥大钟楼为例》,安徽大学2018年,第11页。
- ⑤⑪⑫⑳ 奇峰《新录》,《新闻学刊全集》,《民国丛书·第二编·48》,上海光新书局1930年版,第325页。
- ⑥⑲ 胡道静《在展览会里的中国报纸》,《新闻史上的新时代》,《民国丛书·第三编·41》,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74页。
- ⑦ 吴凯声《新闻事业与国际宣传》,《新闻学刊全集》,《民国丛书·第二编·48》,上海光新书局1930年版,第251页。
- ⑧ 王惠超、许恺景《王华轩与〈汉口中西报〉》,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市江岸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武汉文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92页。
- ⑨ 彭永祥编《中国画报画刊(1872-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89页。
- ⑩ 马光仁《近代上海新闻界的对外交流》,林克编,上海市地志志办公室、上海研究中心编《上海研究论丛》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144页。
- ⑫ 赤枫《侨城万国报纸博览会》,《晶报》,1928年6月9日,第2版。
- ⑬⑯⑳ 戈公振《纪世界报纸博览会中国馆之因陋就简》,《时报》,1928年6月24日,第2版。
- ⑭ 万叶《德国世界报章展览会参观记》,《时报》,1928年6月18日,第3版。
- ⑮ 王万叶《参观世界报章博览会记》,《北洋画报》,1928年第201期。
- ⑰ 友《〈燕京新闻〉小传》,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
- ⑱ 谢六逸《发刊词》,载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筹备会编《报展》,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6年1月出版,第2页。
- ⑲ 余姚市文化局编《余姚革命(进步)文化史料选编1919-1949》,1992年版,第322页。
- ⑳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
- ㉑ 此处借鉴高存玲《作为物种的媒介——Media Ecology被湮没的一个维度》中的媒介作为“物种”的观点。高存玲《作为物种的媒介——Media Ecology被湮没的一个维度》,《新闻界》2018年第5期。
- ㉒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0卷)·古籍研究著作》,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53页。
- ㉓ 《罗马教皇东方神父塔爵士钱曾祺贺状》,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筹备会编《报展》,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6年版,第15-19页。

- ②⑤ 戈公振《纪世界报纸博览会》,《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附刊》,1928年第2卷第8期。
- ②⑥ 马光仁《马光仁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页。
- ②⑧ 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至少有戈公振《选论:纪世界报纸博览会》,载《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1933年第1-2期《德国科恩世界报纸博览会》,《东方写真集》,1934年,第126页两份刊登。
- ②⑨ 胡道静《在展览会里的中国报纸》,《报坛逸话》,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74-75页。
- ③⑩ 见《伦敦报纸展览会中最古的报纸》,《中国新书月报》,1931年第9期和申报索引编辑委员会编《申报索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页。
- ③⑪ 中央统计处编《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年第9期。
- ③⑫ 《广丰筹开报展》,《前线日报》,1941年10月16日第7版。
- ③⑬ 《万国报纸博览会中之“神秘”》,《报学月刊》,1929年第1期。
- ③⑭ 汪伯奇《世界报纸展览感言》,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筹备会编辑,《报展》,1936年版,第3-4页。
- ③⑮ 参见卢震京编《图书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77页。
- ③⑯ 俞天鹏编《礼记·学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 ③⑰ 此处借鉴萨义德理论的旅行的理论。载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 ③⑱⑳㉑㉒ 《我们的工作》,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筹备会编《报展》,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6年版,第9页。
- ④⑰ 《世界报纸展览会开幕》,《申报》,1935年10月8日第6版。
- ④⑱ 《新闻快活林副刊》日期未详,转引自《我们的工作》,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筹备会编辑,《报展》,1936年版,第19页。
- ④⑲ 越閒《世界报展会观感》,《新人周刊》,1935年第12期。
- ④⑳ 储玉坤《现代新闻学概论》转引自马光仁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页。
- ④㉑㉒ 树清等《本会世界报展特辑》,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研究会编《新闻学季刊》,1940年第2期。
- ④㉓ 李秀云《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 ④㉔ 张学忠《〈拂晓报〉史略》,《洪泽革命史料选辑第六辑》,1983年版,第119页。
- ④㉕ 《时事简讯》,1943年9月11日。
- ④㉖ 赵岚《解放前乐山新闻业史料补辑》,《乐山史志资料》,1991年-1992年,第21期-第28期。
- ④㉗ 贾树枚《上海新闻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页。
- ⑤⑰ 有史料认为,1926年上海南洋报纸展览会是世界报展发源于中国的证据。例如:钟华俎《记社教学院全国报纸展览》:“至于报纸展览,最早发源于中国。一九二六年(民十五年)上海新闻学会举办南洋报纸展览会,是为报展的开端。经过两年,即一九二八年,外国才有报展出现。”《报学杂志》1948年第8期第24页;孙文铄、谢国明《中国新闻界之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该书也持同一观点“中国的报纸展览,始于1926年……上海新闻学会委员会……举办‘南洋各报展览会’”。
- ⑤⑲ 树清等《本会世界报展特辑》,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研究会编《新闻学季刊》,1940年第2期。
- ⑤⑳ 何扬鸣《民国杭州新闻史稿》,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278页。
- ⑤㉑ 《杨家湾冠盖云集,纪念行署迁昌,同时庆祝中正堂落成典礼,举行书画报展演话剧平剧》,《民族日报》,1944年4月19日第3版。
- ⑤㉒ 曹弃疾《河南省首次全国报纸展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36辑,1990年版,第172页。
- ⑤⑳ 钟华俎《记社教学院全国报纸展览》,南京《中央日报》出版《报学杂志》,1948年第8期。
- ⑤㉑ 戈公振《纪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国闻周报》,1928年第25期。
- ⑥⑰ 钟韵玉《记杭州两次报纸展览会》,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2辑,1983年版,第92页。
- ⑥⑱ 舒宗侨《新闻史上的一页:复旦世界报纸展览会》,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室编《世界新闻事业2》,1980年版,第14页。
- ⑥㉒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范苏苏、王大龙《范长江与青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 ⑥⑳ 周勇编《重庆通史》第2册,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513页。
- ⑥㉑㉒ 冯英子《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所进行的合法斗争》,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 ⑥⑳ 彭亚新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 ⑥㉑ 《本报纪念新刊两周年 筹办全国报展》,《新中华报》,1941年2月13日。
- ⑥㉒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文化建设史》,第163页。
- ⑥⑳ 《关于报展:文化工作者的当前责任——为全国报章杂志图表照片展览会作》,梁寒操《全国报纸杂志图表照片展览纪念刊》,中央日报社1944年6月版,第13-14页。
- ⑦⑰ 朱修道《忆〈拂晓报〉》,毛德富编《百年记忆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政治卷 卷4》,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1页。
- ⑦⑱ 项福库、李艳《近现代中国历史人物讲评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 ⑦㉑㉒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3页。
- ⑦⑳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3-63页。
- ⑦㉑ 涂凌波《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兴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218页。
- ⑦㉒ 陈冷《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一)》,《时报》1905年3月13日第2版。
- ⑦⑳ 徐晓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266页。

(作者郭冲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至刚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毓强】